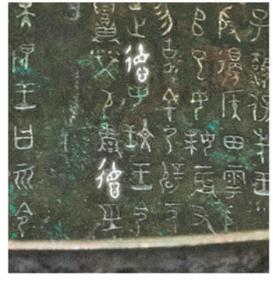


从大孟鼎铭文看「德」字起源

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

毕游



▲青铜器大孟鼎铭文中的两个「德」字。李京肇摄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有一件西周初期的青铜器大孟鼎。在大孟鼎291个铭文中有两个“德”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古代“德”观念的起源。

甲骨文里没有“德”字，但有一个与其形状非常相近的字。为表述方便，这里姑且称其为“值”。“值”字由两部分组成：一側是“彳”，意为道路或行走；另一側是“直”，其形为目上一竖，意为直视。两形会意，为循行视察之义。甲骨文里有大量“王值土方”“王值伐土方”“王值出”等刻辞。从卜辞可以看出，“值”与商王出行巡视及征伐治思想高度相关，有浓厚的武力威慑的意味。

大孟鼎中的两个“德”字，是在“值”字的“直”部下增添“心”部而得。“德”字的出现标志着周人统治思想的重要发展，即从以力服人转向以心服人。

不过，“德”字并非随着周人新观念的形成而立即出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还藏有另一件比大孟鼎更早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称天亡簋。天亡簋中也有“德”字，虽然字形仍为“值”，但字义上已经是“德”了。显然，周人先有了德治的理念，并暂以“值”字表达，而后增添了“心”部以与其新观念相契合。

我们先来看“德”字在天亡簋和大孟鼎中的用法。天亡簋铭文记录了武王克商后举行盛大祭典，虽未提及“德”的具体内容，却明确指出了“德”的强大力量——周灭商的根本原因，正是始于文王、达于天帝、康于武王的“德”。再看大孟鼎，其铭文记载了康王册命大臣盂的训诰，内容已经涉及德治的一些特征。训诰中提到的“正德”“靡德”，相较于“值”无疑是政治文明的历史性发展。可见，“德”字的最初涵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并不完全相同。由于铭文有限，我们需要借助可靠的传世文献来进一步理解周初“德”观念的确切涵义。

在《尚书》和《诗经》形成于周初的篇章中，已经有大量“德”字。例如，周公以成王名义在封语康叔时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庸庸，衿衿，威威，显民”，周公将文王的统治理念概括为“明德慎罚”，“德”与“罚”相对，有养民之义。周公以成王名义在另一篇针对诸侯的训诰中再次提到“明德慎罚”，说：“乃惟成汤……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功；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功；开释无辜，亦克用功。”这里连续用了几个“用功”，意为劝勉、教化，与前“显民”之义相近。周公意在表明：断狱、惩恶、赦宥这些法律措施的目的是劝善，是“明德”——这已明确表达出德主刑辅的观念。德治的内容很丰富，但中心是惠民、保民、康民。

周初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提出德治思想？这是周人对商朝灭亡反思的结果。武王克商时，偏处西土的周邦与存续了500余年的商王朝在体量上相去甚殊，周人亦自称“小邦周”“我小国”，称商为“天邑商”“大邦殷”。惊讶于这场以小克大的胜利，周贵族进行了深刻思考，《尚书》记载了大量相关论述。周人认为自成汤至帝乙，历代商王能够明德敬天，因而得以维持长期统治。而帝乙的继任者帝辛（纣王）不顧天威民情，因此上天令其丧亡。召公认为，夏、商两代都是亡于失德，而有周代商，则是因德受命。“德”“民”“天”“命”是周人统治逻辑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字。

在周初，“德”只是最高统治者的施政理念。进入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德”的内容不断丰富。孔子将“德”视为士人君子的首要素质，“德行”位居“孔门四科”之首。孟子则进一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涂（途）之人可以为禹”——“德”成为人人可以拥有的品格。“德”与“道”是密切相关的，如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当然，儒家与道家的观念不同；孔子所谓“道”是文武之道，“德”是君子之德；而老子所谓“道”则是自然天道，“德”是无为之德。古人还常以“得”释“德”，如《管子》所言：“德者，道之舍……故德者，得也。”德之所在便是心，“心”范畴对于“德”的溯源与养成非常重要，因而为后来的宋明理学家们高度重视。

从“值”到“德”，这一笔“心”的增添不仅是文字的演进，更是一个文明在历史转折中对天下治道的深思熟虑。器以载道，鼎铭所蕴藏的文明基因早已融入我们的民族血脉，揭示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秘密。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博古知今

一场跨越46年的公众考古接力

余冰娇

这是一场跨越46年的公众考古接力。1976年，南京大学教授俞锦标等人在贵州省普定县做岩溶勘察时，偶然在西南一个南北对穿的洞穴（以下简称“穿洞”）发现了骨化石、烧骨及灰炭物等。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洞穴，竟埋藏着数量惊人的文化遗存，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1979年，穿洞遗址展开试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遗存。同年11月，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收到博物馆的邀请到贵州开展工作。在结束室内工作后，他不顾身体虚弱毅然决定前往穿洞现场。

那一天阳光明媚，穿洞前的空地上围满了人。裴文中先生坐在人群中，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向一群入学不久的贵阳师范学院的学生讲述考古的故事。现场没有扩音设备，没有投影屏幕，却为年轻的学子揭开了考古学的神秘面纱。这也成为贵州公众考古实践的起点。

称“世界之最”。他原本期盼亲自主持这项意义重大的发掘工作，却因身体状况不项遗憾缺席。即便如此，在病榻上，裴先生仍心系穿洞，关切着来自田野的进展。

秉承着前辈的嘱托与学术使命，穿洞在1981年至1983年又迎来了两次系统性发掘，共出土各类石器2万余件、超过1600件骨角器，制作之精美、数量之集中，在同期遗址中罕见，为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技术水平与生存智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实物。同时，遗址还出土了包括两个古人类头骨化石在内的20多种动物化石200余件，初步构建起约1.6万年前该地区人类与生态环境的生动图景。

穿洞的秘密远未穷尽。2022年，在新的学术理念与科技手段支撑下，穿洞遗址的考古工作再度启动。多层次的文化堆积、丰富的遗迹、石器及骨角器接连面世。更重要的是它将人类在穿洞活动的时间轴从原先认识的1.6万年大幅向前推进至6万—7万年前，填补了东亚地区现代人

演化链条上的重要缺环。时光流转，距离1979年整整46年后，那群在遗址前曾与裴文中先生面对面的青涩学子重回故地。2025年11月25日上午，在普定县第五小学多媒体教室，新一轮穿洞遗址公众考古活动拉开帷幕。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长兴龙为师生们系统梳理了穿洞的重要发现和最新研究，讲述穿洞在还原远古人类生活面貌方面的重要意义。下午，贵阳师范学院79级校友与普定五小的学生分批走进遗址发掘现场与文物库房。考古队员在发掘现场详细介绍了发掘进展和浮选流程，孩子们围在浮选设备旁，目不转睛地盯着水流中翻滚的土粒，亲自体验在土粒中翻拣微小的遗存。

对如今已鬓发微霜的79级校友而言，熟悉的场景再现。他们站立在探方周围，试图找寻第二次考古实践的新发现。当年的试掘坑如今变得更大更深，当年略显简陋的考古工具如今也辅以全站仪等高科技仪器。岁月流转，改变的是规模和精度，不变的是对这本“地下无字史书”的敬畏与



百年晓明楼

赵前

在江苏省沛县的初级中学校园里，有一座青砖灰瓦的老楼。它不高，也不显眼，却陪着我长大。后来我才知道，它叫晓明楼，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共沛县县委成立旧址。

小时候，我们在校园里玩耍，便觉得这座楼和别的教学楼不一样：台基高出地面半米多，青砖墙面不粉不饰，门窗是圆拱形的，走廊有拱券和立柱。我们在廊下躲雨，在台阶上坐着聊天，从没想到它已经站在那里近100年。再后来读书多了，才知道它建于1919年前后，最初是法国传教士兴建的天主教附属建筑和教会学校的一部分。教堂后来拆除，神职人员楼和教室保存下来，统称“晓明楼建筑群”。这座楼确实“中西合璧”。外观是典型的北方传统样式：歇山屋顶，五脊齐备，檐下斗拱挑



▲晓明楼。赵前供图

檐，屋脊装饰讲究，带着徐州民居的气息。但走进室内，又是另一番景象：拱券门窗、彩色玻璃、壁炉烟囱、半地下室结构、豪式木屋架和螺栓连接技术，都是西式做法。平面呈曲尺形，走廊分隔空间，功能分区清晰，明显体现了西方理性化的空间设计。青砖、斗拱与拱券、彩窗并存，让人一眼就能看出那个时代的复杂与交汇。

但晓明楼的意义，不止于建筑。20世纪20年代，这里创办教会学校，后来发展为县立中学、沛县高中。许多沛县青年在这里接受新式教育，学习科学知识和现代思想。它被称为沛县近现代教育的发祥地，并非虚言。这里走出了两院院士、教育家、知名学者等杰出人物。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是中共沛县县委的诞生地。1929年，中共沛县县委在此成立，朱菊池任书记。以校长孟昭佩为掩护，地下党员在校内组织图书室，传播进步书刊，发展党员，领导教师和学生开展斗争、增膳斗争。后来，党的组织从校园走向农村，发动工增工资、“二八改三七”分成、渔民罢渡等斗争，逐步壮大。如今，晓明楼被列入江苏省革命文物名录，是徐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对我来说，这些历史从未停留在纸间。高考那年，我就在晓明楼所在的沛县初中考场参加考试。如今，我已是攻读历史学的博士生。再回来，我总会抬头看看那青砖墙面和拱形门窗——它见证过我走进高考考场，见证过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也见证过中共党员的红色信仰……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三峡考古绘就文明交流生动画卷

方勤



图①：湖北宜昌大平溪白狮子湾遗址出土的大溪文化彩陶瓶。图②：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始兴县景阳河出土的双虎钮青铜罍。

三峡考古，既是中国大型建设工程文物保护项目的杰出代表，也是百年中国考古的一个缩影。30年间，考古研究从未停止，每一项成果，对于三峡文物保护、传承和发展，都意义重大。绘就了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生动画卷。距今约200万年建始人与巫山人，距今20万年的长阳人，以及距今1万年左右的桅杆坪遗址，开启了长江文明的先声。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6000年，以瞿塘峡为界，这里的文化分为东、西两大系统。瞿塘峡以东地区可纳入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区系，即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文明不断演进；瞿塘峡以西即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别是玉溪下层遗存、玉溪上层遗存、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渐次发展。

公元前5500年—公元前2200年，长江文明步伐加快。三峡地区作为长江中游、上游的文化、资源沟通廊道，交流频繁，考古遗存丰富，文化序列亦明显分为东西两个系统。峡江东部地区长时间受到江汉平原文化的影响，是长江中游文化分布的西界，也是向西传播的前沿。考察城背溪—大溪文化系统，可以看到，公元前5500年，生活于洞庭湖平原的农业人群向北、向西移动，进入峡江东部，开始使用陶器。三峡地区河网纵横，渔猎资源丰富，先后形成了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大溪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种植开始加大，遗址主要分布于长江及其支流两岸。陶器制作水平不高，以炊煮使用的釜、支座为主。这一时期，三峡地区与关

交流。同时，柳林溪文化还出现了长江中游最早的彩陶，仰韶文化的彩陶远至三峡坝区的中堡岛遗址。

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距今5200年左右）形成于江汉平原中心地带。以鼎为炊具的屈家岭文化，向西发展，取代了分布于峡江东部的大溪文化，实现了长江中游的文化统一。峡江东部作为该文化西界，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距今4200年）。屈家岭文化分布的西界在巫峡一带，更是传播到了重庆忠县，这是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影响的巅峰时期。至石家河文化在峡江的分布有所减弱，基本止于西陵峡。夏商周时期，三峡地区主要是巴人、夔人、楚人的活动区域。这一时期，三峡地区从一个游离于长江中游的单独文化区，实现了融入中游、融入华夏的历史过程，是三峡地区文化格局的变革时期。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900年，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强势南下，但对峡江东部地区影响甚微，分布于这一区域的白庙表现出强烈的区域特征，峡江东部地区第一次以一个独立文化单元出现于长江中游，

为巴人的蓬勃发

河文化因素，如绳纹釜，出现了大量与楚有关的陶器。公元前634年，楚成王灭夔，开始对这一地区直接管理，楚文化最远到达了忠县一带。

丰富了秦汉以后峡江历史的认识

秦统一六国后，峡江地区成为历代王朝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峡江湖北段汉代以后设县，包括秭归、巴东等，县名与所辖州郡多有变化。东汉末年始，夷陵成为郡或州、府治。自唐代始，秭归多为归州州治，巴东在清雍正时期一度纳入土司管理。三峡考古，亦进一步丰富了对秦汉以后历史的认识。

三峡地区是长江上中游的廊道，也是与中原不断交流交往交融的见证。长江三峡已于2025年7月被正式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首批重点建设对象共18处，其中重庆12处，湖北6处。通过持续推进学术研究、促进考古成果转化，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明、文化标识空间，才能发挥长江三峡在“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中的独特价值，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

三峡地区是长江上中游的廊道，也是与中原不断交流交往交融的见证。长江三峡已于2025年7月被正式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首批重点建设对象共18处，其中重庆12处，湖北6处。通过持续推进学术研究、促进考古成果转化，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明、文化标识空间，才能发挥长江三峡在“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中的独特价值，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正在制作风筝的张效东。张效东供图

「只要风还在吹，我就一直做风筝」

唐兴华

春风刚起，山东潍坊寒亭的一间工作室里，竹香与纸墨气息交织。77岁的张效东坐在木桌前，手中一根细竹正按照图纸上的样式在火焰上缓缓弯曲。抬头望去，屋内墙壁挂满风筝……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效东以60多年的坚守，让千年纸鸢焕发新生。“我离不开风筝，风筝就是我的灵魂。”张效东笑着说。

张效东8岁起便跟着祖父学习制作风筝。与风筝朝夕相伴60多年，他已熟练掌握180多个风筝品种的制作技艺。只要说得出手，他都能扎出来。近20年来，他将声、光、电等元素，以及齿轮、杠杆等机械原理融入风筝制作工艺，让风筝在空中能飞、能动、能响。

有一年，他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扎制一只巨大的飞龙风筝，造型精巧，绘画细致入微，他十分满意。不料放飞时，风筝刚刚升空，忽然一阵大风袭来，风筝被撕裂。那一天，张效东心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件事让他意识到，风筝不仅是艺术，更是一门与自然对话的技艺。风速、气温、空气流动都会影响风筝的飞行状态。“扎制、绘画、裱糊再好，如果飞不上天，也算不上成功的风筝。”“四季之中，为啥以春天最宜放风筝？春季多东风，气温回升后，空气上升形成托举之力，在相同风力条件下，风筝起飞更稳、更平。”张效东说。

对张效东来说，真正有生命力的技艺，必然是一门与时俱进的艺术。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他曾扎制一只10米长的“神五”风筝，高达三层楼，直径1.5米，需要20多人同时放飞。风筝不仅在造型上尽力模仿火箭，还巧妙借助遥控装置模拟发射分离过程，当风筝升空后，上下部分自动分离。

《青蛙与螳螂》是他的另一件得意之作。其灵感来自一次清晨散步时，他在池塘边看到的生动场景：一只螳螂在荷叶上与青蛙对峙，当青蛙欲上前捕食时，螳螂便举“刀”相对，二者你进我退，反复周旋，十分有趣。回到工作室后，他反复琢磨，最后借助风轮和机械转动结构，将这一幕鲜活地搬上了天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将齿轮等机械原理融入风筝制作，也由此开启了动态风筝的创作之路。随后，他陆续创作出《猫鼠争春》《螳螂捕蝉》《翼龙》等20多幅动态风筝作品，有的眼睛会转动，有的嘴巴会张合，有的还能发出声音。凭着对风筝的热爱和对百工技艺的融会贯通，他琢磨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

他常常思索：如何将风筝做得贴合年轻人审美，引起更多年轻人兴趣，从而将这门老手艺传承下去？近几年，他积极探索传统风筝与电影、游戏、潮牌等跨界结合。在电影《封神：朝歌风云》中，他参与制作了巨大的“玄鸟”道具。整件作品使用3000多米的竹条，历时两个多月完成，双翼可动，需要多人托举，营造出恢宏壮阔的视觉效果。在张效东看来，无论造型、材料如何变化，风筝始终是风筝，仍在于牵动风筝的那根“线”。守住传统技艺的“根脉”，风筝才能飞得稳；敢于创新，才能飞得远。

第四十三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暨2026潍坊风筝嘉年华即将举行。像往年一样，张效东忙着为这次活动准备作品。今年是马年，他计划扎制《骏马迎春》的大型动态风筝，通过齿轮结构呈现出骏马在天空中奔腾的效果，“只要风还在吹，我就一直做风筝。”（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

本版邮箱
ysbj@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王璠